

【書評】 Book Review

柏克萊加州大學圖書館（編）：
《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李慶*

近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陳先行主編、郭立暄等編寫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古籍善本書志》（以下簡稱《柏克萊善本書志》），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中文古籍書志。值得學界重視。

中國古代的目錄學，講求「辨彰學術、考鏡源流」。（章學誠《校讎通義序》）從來就不是單純的「記錄書目」之學。隨著時代的發展，現代書目著錄的內容和編撰形態有了很大的發展變化。中文古籍書目，作為其中的一個部分，也呈現出多種的樣式。

現在的中文古籍書目，就其編撰的類型而言，筆者認為，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

一類是根據書名、作者、主題或圖書館的插架等情況，照錄圖書卡片，以便於讀者檢索，且備登錄庫存——這或可稱之為「檢索管理型」的書目。

一類是把現存資料（如該書的內容簡介、序跋、作者的生平、有關的記載、甚至是書影等等），匯成一編，以供研究參考——這類或可稱為「圖書資料型」的書目。

還有一類是對現存典籍，加以考索，做出判斷，自成一說的書目，或可稱「研究考證型」的書目。這類書目當然也是資料，然而，它決不僅僅是資

* 作者為日本金澤大學外國語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料的彙集，而是在注重記載典籍有關資料的同時，通過自己的研究，辨別有關的問題，提出自己的見解。

前兩類的編寫，在某種程度上，當然也具有一定的學術性，但相對而言，較多是技術性的工作；而後一類，則具有較多的研究性質，非專門此學，無學力識見者，難以爲之。而擺在我們面前的這部《柏克萊善本書志》，正是這樣的一部由專家學者編撰的書志，非現在一般「文抄公」所編者可同日而語。

這部書志，有如下一些特點：

第一、多著錄明清時代的善本，有獨特的新資料。

談到古籍善本，人們頭腦裏浮現出的，多半是「百宋千元」，但這部書志中，著錄了宋本22種，元本16種，加起來也不過占全部的約百分之五。多爲明清時代的善本。

明清善本的著錄，相對比較困難。一是前人研究的資料比較少。雖說近年對於明清典籍的重視程度，已經有所改變，但明清善本，如一些方志、族譜、個人的筆記、畫錄、醫方、各種各樣的著述，還有散見的小說、戲曲等，前人多未加研究，沒有現成的資料，必須自己從頭做起。二是有些明清版的書相對較爲人所知，如果照錄前人之說，就顯繁冗。因此，對一些明清善本，如何攝其精要，加以論述，在著錄中如何不落俗套，顯現藏書的特色，就要看編撰者的水準和見識了。

在此書志中，就頗具特色。比如對「《荀子》二十卷」（子部，132頁），此書其實就是明代翻刻嘉靖十二年世德堂《六子全書》本。關於此書，前人有記載，有點古籍版本常識的人，多已知曉，無需繁引。因而，此《書志》對其作者、板式、序跋等只作簡要的記述。但是，編者注意到柏克萊所藏該書有近人「夕薰樓主人凌宴池」的四條跋語，於是作了全文過錄。（133頁）其中記載了書中過錄的顧千里臨惠棟校本、紐匪石的校語以及「朱筆」批校的情況。推斷「朱筆疑是半農先生校語」。又在跋文中說「半農先

生朱批，于荀子可謂推崇備至」。由此，不僅概述了《荀子》文本在近世流傳情況，可以瞭解到《六子全書》本的《荀子》在明清到近代的流傳和對學人的影響，也為查考凌氏的情況提供了線索。關於這「凌氏」，書志又在「《皇宋十朝綱要》二十五卷」條下（史部，59頁），錄凌氏跋語，和「凌宴池」「海門凌氏」的印章；「《翰林羅圭峰先生文集》十八卷《續集》十五卷」（集部，289頁）條下，也記錄了凌氏「夕薰樓」「曾經宴池讀過」等印章。讀者如互相映證，當可推知該人的簡單情況。這就很見編者的用心和該書志的特色。

類似的情況，在書中多有可見，比如「《玉溪生詩意》八卷」（268頁）條下所錄「周子堅」的批語；「《空同先生集》六十三卷」（291頁）條下所錄「吳仲培」跋；「《事類賦》三十卷」條（子部，212頁），記載此書和《廣事類賦》在明清時代，多有刊刻，和無錫華氏一族，多有關係。又通過《華氏宗譜》，對明代的校刻者「華麟祥」一族的世系，作了考究。凡此等等的資料，都是其他書志中難以見到的。

詳其當詳，略其當略，突出了所藏善本的獨特之處，使讀者有新的收益，頗可見到編者的匠心所在。

第二個特點，注重對典籍版本的確定和流傳過程的考察。

宋元版的善本，由於前人藏家早就重視，明清以來的各種藏書志，近人所編纂的《藏書紀事詩》《書林清話》等，往往有所記載，可以參考。而要確定明清版本是何時所刻，考查在近代以來的典籍流傳過程，頭緒繁雜，相對比較困難。這本書志中，對此做了相當的研究。

如著錄的「《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經部，19頁）此書原為「十行本」《十三經》中的一種。然而，這究竟是什麼版本呢？《嘉業堂善本書影》收錄，認為是「宋本」，而《嘉業堂藏書志》著錄為「宋刻元明補本」。但是，編者根據日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著錄的同樣的「十行本」《論語註疏解經》，在刻工「王英玉」一葉，有「泰定四年」字樣，泰

定是元代年號，而此本的刻工中也有「英玉」，又參考其他有關書志，定此書為元刊本。不僅如此，還根據刻工中有「江元壽、江盛」等名字，這些刻工又見於明代嘉靖十一年間刊刻的《朱文公集》，進而定此書為「元刻明遞修本」。在書志中，簡要地指出，此書在宋代岳珂的《九經三傳沿革例》中曾言及，元代刻成，板片後入明朝，明代的閩版、監版、汲古閣版的《十三經注疏》，多出自此。清代阮元重刻《十三經注疏》的底本，也是此「十行本」。凡此，都是要做相當的研究，方能寫出的。

又如，「《函史上編》八十二卷《下編》二十一卷」（史部，47頁）中，對明代鄧元錫所著的此書，編者通過把「念初堂活字本」「萬曆本」「南豐曾懋爵活字本」「崇禎鄧應端本」等的對照，說明其不同，並畫出了該書的版本流傳圖（48頁），頗顯功力。

第三個特點，重視對同一書不同印本的鑒別，糾正有關記載的錯誤。

該書志對各種著錄的書，不僅確定其版本，而且對該書是同一書中的那一種印本，作了非常好的研究，並糾正了前人著錄的一些缺誤，這就更為可貴。

同一版片，刻成之後，在先後的印刷時，會作一些更改，形成不同的印本。要確定一書是什麼印本，比確定版本更為困難。如，書志中著錄的《古文尚書疏證》八卷（經部，7頁），這是閻若璩所撰，一般學者都熟知之書。現藏本書前有黃宗羲、閻詠康熙甲申（四十三年）的序，還有乾隆十年閻學林（閻詠之子）序。此書最初為閻學林的眷西堂本。如果不加注意，著錄為「眷西堂本」，當然也可以，但是，編者考查了此書的刊刻經過，並根據《四庫》本以及上海圖書館所藏抄本對照，根據最初本有康熙四十五年胡渭的序，確定其為「翻眷西堂本」，這不僅揭示了胡渭在該書成書過程中的作用而且說明瞭各種不同本子的關係。

比如「《南華山人詩鈔》十五卷《續集》四卷」（集部，312頁），這是清代張鵬翀的詩集，清乾隆年間的刻本。照理說，刊刻的時間尚未久遠，過去「經眼者」著錄的版本也大多相同。但是此《書志》的編者，經過把各種

本子的對照，指出實際上有不同的印本，如上海圖書館所藏的幾種本子和近年刊行的《四庫未收書輯刊》的本子，就是不同的印本。指出：各本「內容出入，編次亦異，蓋有初印、後印之別，或版片轉手重為編印故也。」（312頁）

又如，對大家都熟悉的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的作品，書志著錄有「《玉茗新詞》四種八卷」（373頁）這其實就是後來乾隆年間「吳郡書業堂」「金閭映雪草堂」重修，題為「玉茗堂四種傳奇」或後來又稱為「臨川四夢」本的祖本，因有初印本的封面在，使我們得知，此書最早的書名為「《玉茗新詞》」。

此外，在「《陽山顧氏文房小說》四十種五十八卷」（叢部，380頁）條下，考定此書在明代至少有兩種版本；「《五朝小說》四百五十三種四百六十二卷」（叢部，385頁）條下通過具體考查，指出了《中國叢書綜錄》「出版時以卡片發排，匆促失校」（397頁）之誤。

凡此種種，多是比照其他圖書館的藏本及有關的圖書目錄，逐一考訂，確定為初印或後印，糾正有了不少著名書目錯誤的情況，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資料。這都反映出編者們所傾注的心血，是這部書志最難能可貴之處。

這部書志除了上述特色以外，其所載書籍的流傳和這本書志編撰的本身，也多令人回味。

翻閱這部《柏克萊善本書志》，或是由於近年一直在搞日本漢學研究之故，我發現不少曾為日本學者所收的書下，有劉承幹「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記」的藏書印，這些書當是原嘉業堂所藏。關於劉氏的藏書聚散，吳格的《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聚散考略》，¹有很好的論說。他披露了上海圖書館所藏稿本《壬午讓書紀事》記載的劉氏藏書在上海「孤島」時期的一些鮮為人

¹ 吳格：〈吳興劉氏嘉業堂藏書聚散考略〉，《書目季刊》第39卷第4期（2004年）。

知的事實。而與此有關的是，《書志》中的典籍，多有日本學者「今關天彭」和「三井文庫」的藏書印。如「《周禮輯義》十二卷」（經部，13頁）、《三禮述注》七十一卷（經部，16頁）《易堂問目》四卷（經部，28頁）等。又如「《宋元資治通鑒》六十四卷」（史部，57頁）條下，記載，該書多有「日人朱筆點校」，等等。關於「今關天彭」的生平簡況，拙著《日本漢學史》第二部²有所介紹，或可參見。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他曾是一個記者，長年生活在中國，對中國近代的學術文化多有研究，把胡適等的著述，翻譯成日文。他也曾為「三井」集團購書，其中也有嘉業堂的舊藏。這或可使我們對嘉業堂藏書流傳之狀況，又有新的認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井文庫因「三井財團」解體，相當一部分書（包括日本文書和漢文書籍），在一九五〇年前後，被柏克萊大學一括購入，成為現今該校圖書館漢文古籍的基本庫藏。³這些圖書由中國而流入日本，又被美國購入的流傳過程，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漢學流變的一個側面。

對於世界上漢籍流傳和收藏的情況，據筆者所知，海外對此已經有所研究，比如，在一九六〇年前後，日本學者專門考察了加州柏克萊大學東亞圖書館的三井文庫藏書，著有《柏克萊加州大學所藏三井文庫舊藏江戶版本書目》，⁴對於日本國內所藏，近年編有《靜嘉堂文庫的善本書影》等大量書目書志，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哈佛大學等也編製了有關書目、書志，這是國內學界已知曉的。歐洲方面對所藏漢文典籍，也作了調查研究，如編有《梵帝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等。由此出發，如果我們對中國典籍在世界流布的狀況作進一步調查，那就一定可以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在世界的流布狀況，對世界漢學研究的變遷，有更深入的認識。或許是因為編撰時間

² 拙著《日本漢學史》第二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468。

³ 參見長谷川強《海外資料調查——旧三井文庫本》，載《国文学研究資料館報》第22號（1984年3月）。

⁴ 岡雅彥等（編），《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レー校所蔵三井文庫旧蔵江戶版本書目》（東京：ゆまに書房，1990年）。

和其他條件有限吧，《柏克萊善本書志》對這方面的考釋稍顯簡略，如果再加補充，那就更顯光彩。

最後，還應提一下的是，這本書志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邀請國內學者編撰的。在近一個多世紀來，我們的民族心理中潛存著一種「自卑」崇洋的心態，似乎被外國人一捧便身價百倍。我並不認為外國做了什麼工作，我們也就一定必須如何，以平常心待之可也。然而現在外國的著名圖書館，邀請中國大陸的有關專家為他們編撰書志，顯現出一種世界文化交流的新動向，面對這樣的現實，那麼，海內的有關部門，能否也應該考慮一下我們自己應該如何的問題呢？